

# 总 志

## 【正德】《四川总志》(三十七卷)

明熊相纂修。熊相，字尚弼，号台峰，明代江西高安人，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进士，任四川清军御史，正德十二年（1517）、十三年（1518）两度巡莅嘉定州（今四川乐山），后因病返回江西。《国史经籍志》著录其《台峰集》六卷。除《四川总志》之外，熊氏还在江西纂修过《瑞州府志》十四卷，《明史·艺文志》有著录。

此志为四川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种省志，纂修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据史料记载，在此之前，明朝修纂四川总志至少有过两次，一次是在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即此志目录前所记：“四川旧志，天顺庚辰布政马君显聘提学佥事眉山黄君明善所纂也。”一次是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即万历（1619）《四川总志》凡例所云：“是书自成化间创修。”然而此前历次纂修的四川总志，均未见流传下来，只有此志得以完整地保存至今。

此志正文分三十五门五十五目，约52万字。其三十五门分属三个部分：本布政司，各府、州，通志。布政司下分十一门，各府、州下分二十五门，通志下分四门。其中布政司与各府州有少数门类名目相同。书首附总图三幅，于四川之舆地、疆域绘制较详，乃迄今所见四川最早的舆图实物。志前有卢雍序。卢雍，明长州（今江

苏苏州)人,字师邵,正德进士,授御史,著有《古园集》。

此志虽然纂修年代较早(距今已490余年),但对于当时四川境内七府六州、十九个土官衙门的历史沿革、疆域、山川、古迹、民俗、人物、文词等记载甚详,无一不备。历代年表中,对于四川的沿革变迁记述尤为详尽,达三卷约3.5万字。这对于研究四川及邻近直辖市、省、区古代历史地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各土官衙中,则对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部落的历史沿革、山川疆域、赋税土产、民俗风物、民族习性(包括藏、彝,苗、羌、回、土家等)作了详细记载,是研究四川古代少数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一部较早较完整的史料。例如,正德《四川总志》载,全国最早以“书院”冠名的“士子肄业之所”,是唐贞元九年(793)于今遂宁市西南书台山下建立的张九宗书院。不过,它与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的书院(如魏了翁讲学的鹤山书院)那种学者聚众讲学治学授徒的性质还有相当的距离。但这毕竟属于全国最早由私人建立的属于读书人的书院。又于各府州文词门中,对明代中叶以前有关四川的诗文词赋收录较详。在此之前,只有南宋初,四川安抚使袁说友命属官扈仲荣、程遇孙等纂修《四川志》时编的《成都文类》五十卷。一般认为,《全蜀艺文志》是在《成都文类》的基础上扩编而成,事实上,正德《四川总志》各府州文词门,也是其后杨慎等人编纂《全蜀艺文志》的重要资料来源,这一点尚未引起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

另外,此志的编纂方式,与明末和清代以后之省志不同,乃是先按地区分列,各地区之中再列门类(清代以后之省志则反之)。这正好体现了那个时代纂修地方志的特点,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正德十三年(1518)的原刻原印本今已无传,仅有一部嘉靖十六年(1537)后补刻重印的本子,因此,卷五的历官布政使增补至嘉靖十六年(1537)任。

**【嘉靖】《四川总志》(八十卷)**

明刘大谟等修，杨慎、杨名、王元正等纂，周复俊、崔廷槐重编。

刘大谟，字远夫，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嘉靖十九年（1540）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秉心诚明，勤于政事，颇有政声。嘉靖二十年（1541），都御使刘大谟叹正德《四川总志》“草草成书”，于是请杨慎、杨名、王元正三人编撰省志。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编修，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明世宗时因议大礼案，贬戍云南。其记诵之博，著述之富，为明代第一。而刘大谟也正是乘杨慎从云南回新都之际，请其参与编撰的。杨名，字实卿，四川遂宁人。嘉靖八年（1529）殿试一甲第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明世宗时因直言进谏，遭贬。居家二十余年，侍亲至孝。颇有文采，为时人推重。其参与省志之编，正是遭贬居家之时。王元正，字舜卿，号玉垒，陕西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翰林检讨。明世宗时亦因议大礼案，谪戍四川茂州卫。王元正在茂州讲学二十余年，多有成就。其参与编省志，亦是谪戍四川茂州之时。

杨慎、杨名、王元正都是进士出身。其中，杨慎是状元，杨名是探花。三人都有文采，都在翰林院任职，而更巧的是，三人都是遭贬的人。难怪主修人刘大谟会说：“王氏玉垒、杨氏升庵，杨氏方洲俱以雍益之豪俊，科第之伦魁，良史之名笔。谪戍遐荒，周流万里。”嘉靖《四川总志》于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开始编撰，十月结束，历时3个月。其中，杨慎负责编《艺文志》，杨名、王元正负责编《帝后纪》、《监守志》、《郡县志》、《名宦志》、《经略志》、《杂志》。杨慎、杨名、王元正三人编成的《四川总志》，据后来崔廷槐《四川总志后序》云“见卷凡百余”，当在一百卷以上。王元正的

《全蜀人物志序》(即为《四川总志》做的序)云:“兹乃缮录,成编二十有六卷,立论十有三篇。”即除杨慎编的《艺文志》外,杨名、王元正编了二十六卷。而杨慎《全蜀艺文志序》(即为《四川总志》做的序)云“为卷尚盈七十”,可推知,杨慎编的《艺文志》当在七十四卷以上。

当嘉靖《四川总志》完成后不久,又被重编。刘大谟《重修四川总志序》曰:“事告,其涣而未萃者,仍托周宪副木泾(即周复俊)、崔金宪楼溪(即崔廷槐)重加编集。”

周复俊,字子吁,号木泾,江苏崑山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在四川、云南做官多年,与杨慎颇有交往。嘉靖二十年(1541)入川为按察副使。颇好文学。崔廷槐,字公桃,山东平度州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嘉靖间入川做佥事。以文学出名。崔廷槐重编了嘉靖《四川总志》的《经略志》和《郡县志》的一部分,周复俊则重编了包括《艺文志》在内的其他部分。

重编后,嘉靖《四川总志》共八十卷,卷首依次载刘大谟《重修四川总志序》、谢瑜《重修四川总志序》、杨慎《全蜀艺文志序》、王元正《全蜀人物志序》、杨名的建置、山川、赋役志序。卷末依次载谢瑜《重修四川总志后序》、崔廷槐《重修四川总志后序》、周复俊《重修四川总志后序》。其编撰体例为,卷一帝王纪、藩封志、监守志,卷二全蜀名宦志,卷三至五成都府,卷六保宁府,卷七顺庆府,卷八叙州府,卷九重庆府,卷十夔州府、马湖府,卷十一潼川府,卷十二眉州,卷十三嘉定州、泸州、邛州、雅州,卷十四东川军民府、乌蒙军民府、乌撒军民府、镇雄军民府、播州宣慰使司、永宁宣抚司、龙州宣抚司、酉阳宣抚司、石砭宣抚司、邑梅洞长官司,卷十五天全六番招讨使司、黎州安抚司、平茶洞长官司、松播等处军民指挥使、四川行都司、迭溪守御千户所,卷十六经略志、

杂志，卷十七至八十艺文志。其中《艺文志》六十四卷，《帝后纪》、《监守志》、《郡县志》、《名宦志》、《经略志》、《杂志》一共十六卷。

嘉靖《四川总志》有着非常大的价值。众所周知，流传至今明代修的四川省志有四部——正德《四川总志》、嘉靖《四川总志》、万历（1581）《四川总志》、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川总志》，而嘉靖《四川总志》修得较好，明人陈继儒就曾说：“读天下志，（嘉靖）《四川总志》为第一，其金石鼎彝、秦汉以下之文，网罗几尽，而立例亦古。”清人宪德亦云：“（四川总志），迨前明之世屡经编辑，惟杨慎、王元正辈所纂（即嘉靖《四川总志》）称善。”由此可见，嘉靖《四川总志》在明清所修四川省志中有着较高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明清两代所修的四川省志中，嘉靖《四川总志》的水平是很高的、很有文采的。在明清两代所有修省志的人员中，修嘉靖《四川总志》的杨慎、杨名、王元正的水平较高，即使是全国范围内，集中状元、探花，全部由进士编修志书的情况也是不多的。而且，嘉靖《四川总志》是经过两次编修的，精心雕琢过的。正是修志人员整体素质高，从根本上决定嘉靖《四川总志》有着较高的质量。所以陈继儒会说“读天下志，（嘉靖）《四川总志》为第一”的话了。

第二，嘉靖《四川总志》对明代后来所修的《四川总志》有着发凡起例的作用。明代后面两次修的省志——万历（1581）《四川总志》、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川总志》，基本上是依照嘉靖《四川总志》的体例进行编修。特别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川总志》，其主编者杜应芳，在杨慎的《全蜀艺文志》的基础上，搜辑嘉靖以来的文章及被杨慎漏搜的文章，编成《补续全蜀艺文志》。《补续全蜀艺文志》与《全蜀艺文志》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巴蜀文化的重要

资料。

第三，嘉靖《四川总志》中的《全蜀艺文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嘉靖《四川总志》中的《艺文志》后来单独刊行，成为一部重要的书。《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包括网罗，极为核洽”，《益部谈资》称其“网罗金石鼎彝，秦汉之文几尽，可谓博矣”。《全蜀艺文志》所收的很多文章是其他书未收的，如书中所收唐代著名文学家李商隐的《重阳亭铭》，不仅李商隐的文集没有收，《文苑英华》也没有收。再如宋代罗泌的《姓氏谱》、元代费著的《古器谱》多已不传，而《全蜀艺文志》中却保留着。而且《全蜀艺文志》具有较高的辑佚价值，如著名学者四川江安人傅增湘的《宋代蜀文辑存》中很多文章就是采自《全蜀艺文志》。另外，《全蜀艺文志》也有很高的校勘价值，因为它所收的文章多是用的嘉靖本或嘉靖以前的版本，有利于校勘家的版本校对。

第四，嘉靖《四川总志》对今天方志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嘉靖《四川总志》本身的存在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明代四川的修志情况（特别是嘉靖时期），而且从全国范围看，保留至今的嘉靖年间的省志并不多，所以它对我们了解明代嘉靖年间修省志的情况，对我们进行嘉靖年间各省省志的比较研究和撰修新方志有借鉴作用。

现存最早的嘉靖《四川总志》，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刊本，这也是仅有的刊本。关于嘉靖《四川总志》的重要研究成果，可进一步参阅旷天全《略谈嘉靖〈四川总志〉》（《巴蜀史志》2005年第4期）。

#### 【万历】《四川总志》（三十四卷）

明虞怀忠修，郭棐纂。虞怀忠，字养纯，浙江义乌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万历六年（1578）任四川巡抚。郭棐，字笃周，

广东番禺人，嘉靖进士，万历初以礼部郎中出任四川夔州府知府，旋升四川按察司督学副使，著有《酉阳正俎》。此外，曾参与纂修《粤大记》和《广东通志》等。纂者除郭棐为总辑外，又有叙州府同知魏朴如、成都府推官游朴等。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万历四川总志”条署名为“明魏朴如、游朴、童良同撰，提学副使南海郭棐裁正之”。又曰：“朴如题叙州府同知，良题诸生，皆不知其里贯。朴，福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成都府推官。”

四川地居长江上游，旧说蜀中有岷、泸、雒、巴四大川，四川之名由此而得。又谓唐以益州置剑南道，梁州置山南道，寻又各分东西，以二州，为四道。宋分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后遂省文为四川。秦以前为巴蜀诸国地，故也简称巴蜀。蜀中古志，三国时譙周撰《三巴志》始，晋有常璩《华阳国志》，常宽《蜀志》，唐郑暉《蜀记》，宋张守约又重修《蜀记》一卷，诸书仅记蜀事人物古迹寺观之类。直至明代才有体例完整的省志，故《稀见地方志提要》万历九年（1581）《四川总志》条云：“通志乃创于明成化时，继修于正德戊寅，嘉靖辛丑，万历己卯，万历己未，于明凡五修。”“万历己卯”指的就是万历七年开始修纂的这本《四川总志》。

此志承嘉靖《四川总志》重修。嘉靖总志，出自王元正、杨慎，杨名诸名家之手，体制精严，备受推崇。此志编例，并没有超越前作，大体沿袭其旧，惟《经略志》、《艺文志》则较旧志颇有增详。此志开修于万历七年（1579），稿成后，至万历九年（1581）薛梦雷任四川巡抚时始成书刊行，其后间有补版，一些门类纪事延续至万历十二年（1584）。

此志约 50 万字，编撰体例为：

《省志》四卷，分十个类目：卷一建置沿革、分野、形胜、城

郭、户口、田赋，卷二先代帝纪、先代后妃纪、藩封志，卷三秩官，卷四蜀省名宦。

《郡县志》十四卷，分二十二个类目：卷五至八成都府，卷九重庆府，卷十顺庆府，卷十一保宁府、潼川州，卷十二叙州府，卷十三马湖府、泸州，卷十四夔州府、龙安府，卷十五嘉定州、眉州，卷十六邛州、雅州，卷十七东川军民府、乌蒙军民府、乌撒军民府、镇雄府、播州宣慰司、永宁宣抚司、酉阳宣抚司、石柱宣抚司、邑梅洞长官司，卷十八天全六番招讨使司、黎州安抚司、平茶洞长官司、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四川行都司、叠溪守御千户所。

《经略志》附以《杂记》，共十四卷，《经略志》分二十一个类目：卷十九财赋、盐法、茶法、钱法，卷二十屯田、水利、驿传、兵防、木政，卷二十一南诏、西番、茂州羌、黎雅夷、叙泸夷、芒部乌蒙东川乌撒诸夷，卷二十二松潘、威茂、安绵、建昌、叙泸、重夔。《杂记》分五个类目：初王、僭据、叛臣、群盗、灾祥。

《文》卷二十三至卷三十，共八卷，分二十五个类目。《诗》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四，共四卷，分十四个类目。

其纂修体例悉遵《大明一统志》例，而内容则主要参照嘉靖《四川总志》，所以门类设置也本于嘉靖旧志，仅于职官、人物、赋税等少数门类中新增旧志以后诸事。另外，建置中，个别地域也有局部变更。对于此志的评价，历来毁誉参半。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万历四川总志”条曰：“其书于尹吉甫、商瞿、董永、杨时之类，旧志误收者，颇有驳正；于赵戒、张商英之类，旧志滥美者，亦颇有简汰。惟《职官》不载守令，未免疏略。而以先代《帝纪》列于前，亦非輿记之体也。”其实，在山川古迹、民俗风物、赋税物产、科举人物、书院寺观以及艺文等方面，此志颇史料价值。例如，宋郭印撰《云溪集》，收诗数百篇，已佚，散见《永乐大典》各韵



中，皆题曰《云溪集》。《宋史·艺文志》及诸家书目均未著录此书。只有厉鹗《宋诗纪事》载郭印为成都人，政和中进士，而不详其官爵。所录诗仅二首，其中一首从《全蜀艺文志》摘出，为《游大隋山》诗。另一首则是从万历九年《四川总志》摘出，即《游下岩寺》诗。又如，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记南宋王坚守合州，也采自万历九年《四川总志》。

此志现存万历九年（1581）原刻本。

### 【万历】《四川总志》(二十七卷)

明吴之皞修，杜应芳等纂。吴之皞，湖北黄陂人，万历进士，万历末由监察御史出任四川巡抚御史。杜应芳，湖北黄冈人，万历进士，官四川按察司督学副使。据《明史·艺文志》记载，他撰目录学著作《补蜀艺文志》五十四卷。

此志凡例曰：“是书自成化间创修，洎嘉靖间聘杨升庵、王玉垒、杨方洲三太史续修之，万历己卯乃督学郭公重加裁定，合今番则修之者四矣。”此志依照万历九年（1581）旧省续修而成，门类一仍其旧，分八个大门类，部分门类下列有细目，约60万字。卷首吴之皞序、嘉靖旧志王元正序、万历八年（1580）旧志郭棐序。省志：卷一建置沿革、分野、形胜、城郭、户口、田赋；卷二先代帝纪、先代后妃纪、藩封志；卷三秩官；卷四蜀省名宦。郡县志：卷五至八成都府，卷九重庆府，卷十顺庆府，卷十一保宁府，卷十二潼川州，卷十三叙州府，卷十四马湖府，卷十五夔州府、龙安府、遵义府，卷十六嘉定州、泸州、雅州，卷十七眉州，卷十八邛州，卷十九东川军民府、乌蒙军民府、乌撒军民府、镇雄军民府、永宁宣抚司、酉阳宣抚司、石柱宣抚司、邑梅洞长官司，卷二十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大渡河土千户所、平茶洞长官司、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

四川行都司、叠溪守御千户所。经略志：卷二十一财赋、盐法、茶法、钱法、木政、榷政，卷二十二屯田、水利、驿传、兵防，卷二十三南诏、西番、茂州羌、黎雅夷、叙泸夷，卷二十四松潘、威茂、安绵、建昌、重夔、巴通，卷二十五松潘、建越、马夷，卷二十六遵义、抚蜀政要，卷二十七事纪、续补艺文志。

此志内容除了增续四十年间职官、人物、科举、赋役及城池公署之修建诸事外，与旧志无太大差异。其最具特色和较有价值者，是应芳等人依《全蜀艺文志》例，广搜博采，审核校订，编纂成《续补全蜀艺文志》五十六卷。除补《全蜀艺文志》之遗漏外，主要是搜集了许多元、明时期的诗文辞赋、记传碑铭，包括杨慎、杨名乃至郭棐、杜应芳等人的著述，达六十万字。合两种艺文志而观之，便可见明代以前四川古代文化之全貌，其珍贵不言而喻。

此志现存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原刻本。严绍璜《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上册第609页有著录。

### 【康熙】《四川总志》(三十六卷)

清蔡毓荣等修，钱受祺等纂。蔡毓荣，字仁庵，辽东锦县人。汉军正白旗，兵部尚书蔡士英次子。初授佐领，兼刑部郎中。累迁至秘书院学士。康熙初，授侍郎，历刑、吏二部。康熙九年（1670）以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任四川总督。以四川民少田荒，多次上疏言四川招民垦荒事宜。康熙十四年（1675）率绿旗兵征讨“三藩之乱”，后领衔绥远将军，总统绿营。平定叛乱后，还任湖广总督，继调云贵总督，累上疏论云南善后事宜。因被劾隐藏吴三桂孙女为妾，坐罪遣戍黑龙江，后赦还，康熙三十八年（1699）卒。《清史稿》卷二百五十六有传。钱受祺，字介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一说山阴（今绍兴）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康熙十年（1671）任成

都府知府，官至工部都水司主事。著有《易义敷言》十六卷。

此志为清代首次纂修之四川省志，乃全国各省中成书最早的一种，较明修诸志为详。所以仍袭用旧称“总志”，也是以此称名的清代唯一的一种省志。其后纂修的各种省志，均更为“通志”。此志成书刊行于康熙十二年（1673），而开局举事则在十年以前。康熙三年（1644）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任四川巡抚的张德地（原名刘格奉，满洲籍遵化人）一上任，便多方搜求旧乘，并派员广事辑资料，着手编修新省志。但是以诸种原因，历数年而未竟其事。至康熙十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罗森（字约齐，顺天大兴人，顺治进士）出任四川巡抚，继续主理此事，且邀请布政使金鶚，提刑按察使宋可发等人共襄之。蔡毓荣总督全川，有志于此，再邀钱受祺总其事，历时三载得以毕工刊行。

此志书首所附的序文颇多，除了张德地、罗森、蔡毓荣等人撰的序而外，还有四川布政使金鶚、四川提刑按察使宋可发、四川学政按司僉事张含辉，以及四川巴县人刘如汉（清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官广东道监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诸人撰的序。并把明嘉靖、万历年两次修志的“旧序”也刻入书中。最后为钱受祺撰的跋。全志分三十六门附十四门，除艺文一门外，各门之下未再列细目，而艺文门之下则分二类二十目，共约 150 万字。门类设置虽与明代旧志大同小异，而编排体例则迥然异之，开清代方志纂修之先河，因为其他各省志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以后方逐一问世，晚了十三年。各卷编纂之内容，由原来明代旧志中先按地区次列门类而变为先立门类后分地区而志之。以事类为主线，府、州、县从之。首列星野，次为形胜疆域，再次则山川关梁。这便成为清代纂修地方志之通例。此志内容宏富，记述详尽，仅是书首所附舆图便多达八幅，从“天文全图”到“松潘卫关堡图”，对四川全省及各府州厅县

地域描绘极其详细。一些门类如僭窃、筹边等对明末清初四川之战乱，川中各地，特别是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之兵事，设防记载颇详，可补正史之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再一个特点是书首附刻的序跋很多，共十篇，另有记载明代各种旧省志的序跋十余篇。序跋后还附有康熙七年（1668）张德地为采访、搜集、纂修此省志而颁行的“纂修原形”及“译文”，可以看出他们极为重视纂修四川省志。清代的序跋中，不仅记述此志的纂修情况，而且如实地记载了经过多年战乱、几经兵燹之后四川境内遭严重破坏的萧疏、荒凉景象。数十里无人烟；废磴犹在，智井空存；往往焚林蔽以驱猛兽；昔日都市繁华、舞榭歌台，尽没荒烟蔓草中，仅剩断壁颓垣等等。到康熙初期，入清已近二十载，仍旧是满目荒凉，一派萧条。诸多记述，反映出战祸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实为研究明清之际四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第一手重要史料。

总体而言，此志之成书适当兵燹之后，文献无征，采摭未免疏略，记载蜀省郡邑事，终未详备。但考四川建置沿革，大概无误。此志修成于康熙敕修《大清一统志》及敕诸省纂修地方志之前，是清代首部省志，有如此之规，其价值是不言而喻。并且开本和版框尺寸均大于其他志书（包括《畿辅通志》），亦属特别，刻印亦精。

今存康熙十二年（1673）原刻本。

### 【雍正】《四川通志》（四十七卷·首一卷）

清黄廷桂等修，张晋生等纂。黄廷桂，清汉军镶红旗人，字丹崖。康熙末，累迁参领，雍正九年（1731）由四川提督特授四川总督，任四载，乾隆时，历任两江、陕甘总督、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职，乾隆十八年（1753）再次出任四川总督，与四川提督岳钟琪调解当地孔撒、麻书两土司相互攻杀，后奉命督办陕甘军需，

佐清军进讨阿睦尔撒纳以筹划有方，得乾隆称许，后卒于官。张晋生，四川金堂人，康熙举人，官河南镇平县知县。

此志开局于雍正十一年（1733），十三年（1735）校补编纂成帙，于乾隆元年（1736）刊行。书首有黄廷桂、杨秘、窦启英、李如兰等序；明嘉靖王元正、杨慎，万历郭棐、王廷瞻、吴之暉、杜应芳等旧序。全志分四十八门，约 185 万字。卷一图考、星野；卷二建置沿革；卷三疆域、形势；卷四城池、关隘；卷五户口、田赋、学校、祀典；卷六至卷七名宦；卷八至卷九人物；卷十孝友；卷十一列女；卷十二忠义、武功；卷十三蠲政、水利；卷十四盐法；卷十五茶法、钱法；卷十六木政、榷政；卷十七屯田、边防上（松茂）；卷十八边防下（叙泸、建昌）；卷十九至卷二十土司；卷二十一西域；卷二十二兵制、津梁、驿传（铺递附）；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山川；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七古迹；卷二十八祠庙、公署、寺观；卷二十九陵墓、宫室、帝王；卷三十至卷三十二职官；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七选举、成均；卷三十八隐逸、流寓、仙释、祥异、风俗、物产；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七艺文。

因有康熙《四川总志》以资借鉴，是故其体例及内容之编排出入不大。但与康熙志相去六十余年，全省之建置、人口、赋役等已有较大变化。康熙年间大量外省人入川垦殖，本已撤销或合并的县城又重新恢复建制。到雍正六年（1728），把原属四川的一些土官衙门辖地改隶云南和贵州等省，如东川、乌蒙、镇雄三府划归云南省，遵义府划归贵州省等。另将一部分原直隶州升为府，分州又升为直隶州等。对于四川各少数民族地区经过改土归流之后，巩固了清王朝的政权。这些史实，在此志中均得以详细记载。边防门对川中各地、特别重要边镇及关隘之设防、屯兵情况；平定各少数民族部落如藏、彝、羌、回等之战争经过记载亦颇为详尽。其他增修内容较

多者在人物、职官、学校、赋税等门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藏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情况，首次出现在官修的方志之中。于打箭炉（今康定县）迤西的地方，名之“西域”而载入卷二十一，此外各少数民族部落，另有土司门二卷，所记也很详尽。从打箭炉起，经里塘（今理塘县）、巴塘、乍丫（今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叉木多（今昌都）等，一直记到西藏。此为迄今所见正式成书刊行的最早的西藏志书，比乾隆五十七年（1792）和宁刻本《西藏志》二卷要早半个多世纪，为后来西藏方志的纂修开启了先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川通志》”论曰：“《四川通志》在明代凡四修，惟《艺文》出杨慎手，最为雅贍。而其他则未能悉中体要。国朝康熙十二年（1673），总督蔡毓荣、巡抚张德地又续事纂辑。以兵燹之后，文献无征，亦多所脱漏。是编乃雍正七年（1729）黄廷桂等奉敕重修，凡分四十九类，旧志之阙者补之，略者增之，较为详备。其中沿旧志之误，未及尽汰者，如唐韦昭度征陈敬瑄，无功而还；宋岳云为忠州防御使，乃遥授之官，俱不应入名宦。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乃总制全蜀，应入统部，不当仅入保宁府。唐之鲜于仲通依附杨国忠，丧师南诏，新旧《唐书》所载甚明，乃反以为忤国忠被贬，载入《人物》。此类尚不免地志附会缘饰之习，然其甄综排比，较旧志则可据多矣。”

今存乾隆元年（1723）补版增刻本，乾隆《四库全书》抄写本。

#### 【嘉庆】《四川通志》（二百零四卷·首二十二卷）

清常明等修，杨芳灿、谭光祜纂。常明，满洲镶红旗人，嘉庆十五年（1810）由湖北巡抚擢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

四川等处军务兼管巡抚事。杨芳灿，江苏金匱（今无锡）人，乾隆拔贡，会典馆总纂。自著有《芙蓉山馆诗稿词稿》以及文抄、尺牍等四十余卷传世。谭光祜，江西南丰县人，由四川夔州府通判升任湖北归州（今秭归县）知州，清嘉庆十四年（1809）署四川潼川府知府。

此志为四川现存第七种省志，也是正式成书刊行的最后一种。常明《重修四川通志序》曰：“自壬申春肇事，迄甲戌冬稿本初就”，然后“删伪补遗，芟繁剔复，如是者又年余，乃得付割厥而成书”。即嘉庆十七年（1812）开局举事，特聘杨芳灿入川主纂，杨时任会典馆总纂，五历寒暑，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成书刊行。

全志分十二门六十三目，约 388 万字，另附卷首二十二卷，计 15 余万字，分装百六十册，卷帙浩繁，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为旧志的五倍，可谓四川通志之集大成者，对于研究四川全史具有重要价值。志前有常明、陈若霖、李銮宣等序；雍正志所载各旧序。

《卷首》二十二卷，主要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皇帝的“圣训”、“宸章”等，以乾隆朝为最多，有许多是关于平定西藏叛乱、征讨大小金川、锁压白莲教起义的资料。另附入汉代以来有关四川之敕诰等史料。

《天文志》一卷。

《輿地志》六十卷：卷二至卷六建置沿革，卷七至卷八疆域，卷九形势，卷十至卷二十一山川，卷二十二江源，卷二十三堤堰，卷二十四城池，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六公署，卷二十七至卷三十关隘，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津梁，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七祠庙，卷三十八至卷四十三寺观，卷四十四至卷四十七陵墓，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七古迹，卷五十八至卷六十金石，卷六十一风俗。

《食货志》十四卷：卷六十二至卷六十三田赋，卷六十四至卷六

十五户口，卷六十六徭役，卷六十七榷政，卷六十八盐法，卷六十九茶法，卷七十钱法，卷七十一木政，卷七十二仓储，卷七十三蠲赈，卷七十四至卷七十五卷物产。

《学校志》六卷：卷七十六至卷七十八学校，卷七十九至卷八十书院，卷八十一祀典。

《武备志》十七卷：卷八十二至卷八十三武功，卷八十四至卷八十六兵制，卷八十七屯田（附屯练、团练），卷八十八驿传，卷八十九舖递，卷九十至卷九十五边防，卷九十六至卷九十八土司。

《职官志》二十三卷：卷九十九至卷百八题名，卷百九至卷百十六政绩，卷百十七至卷百十九忠节，卷百二十滴臣，卷百二十一杂传。

《选举志》二十一卷：卷百二十二至卷百二十四进士，卷百二十五至卷百二十九举人，卷百三十至卷百三十八贡生，卷百三十九武科，卷百四十至卷四十一封荫，卷百四十二荐辟。

《人物志》四十卷：卷百四十三至卷百五十四人物，卷百五十五至卷百五十九忠节，卷百六十至卷百六十二孝友，卷百六十三行谊，卷百六十四隐逸，卷百六十五流寓，卷百六十六艺术，卷百六十七至卷百六十八仙释，卷百六十九至卷百八十一烈女，卷百八十二杂传。

《经籍志》六卷：卷百八十三经部，卷百八十四史部，卷百八十五子部，卷百八十六至卷百八十七集部，卷百八十八附录。

《纪事志》二卷，卷百八十九至卷百九十。

《西域志》六卷，卷百九十一至卷百九十六。

《杂类志》八卷：卷百九十七至卷二百纪闻，卷二百一至卷二百二外纪，卷二百三祥异，卷二百四辨讹。

此“通志”虽云卷帙浩繁，但其门类不脱旧志窠臼，尽管如此，它对旧志中的讹舛多有订正。如旧志名宦不皆蜀人，只有四卷，其具正史者尚多缺而未收，又伪舛杂见，或失其姓，或失其名。此志



则颇重輿地和人物，輿地门份量极重，约占全书三分之一；人物门则多达四十卷，且于旧籍所载者补缀疏脱，刊改谬误。合职官、选举、人物，亦占全书三分之一。在輿地门中，对于四川省十二府八直隶州六直隶厅所辖十一州六厅百十九县之疆域沿革、形势山川、关隘津梁、古迹寺观等，不只是记载详细，且作了精确之考证，并附刻各种圆绘、图表。这对研究四川及其毗邻各省边界之地理沿革、历史变迁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职官门自三代迄于清中叶的一品以至流外，凡属曾设之官均分别叙录，各为一表。题名中自汉迄清，各人物附简历，政绩中均有传记，可谓四川有史以来的人事档案资料库。选举门自唐迄清之进士、举人、贡生、武科、封荫、荐辟等收录极详，网罗令面。人物门分十类，有如乡贤、宦迹、儒林、文苑等。每类按府州县依次连载，均有小传。合此二者又不失为一部巴蜀地方人物辞书。此志还辟经籍志一门，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例、凡蜀人著述分经、史、子、集汇为一编。而各有关之诗文辞赋、记传碑铭、奏疏公牒等则分别附载于山川古迹、祠庙寺观、人物风土等各门类之中，未再集中编成艺文门。此志于“西域志”一门增补较多，达六卷，凡天文、輿地诸门类分载明晰，附以藏地重臣政绩、名流艺文。许多资料未见它书收载（包括西藏通志、专志），诚为清代以前官修之较为完备的一种西藏通志。其中“驻藏大臣题名”，“西域职官政绩”，以及一些地方官员出入西藏所作、所题之诗文等等，均不见其他西藏地方志书记载，其价值不言而喻。此志《凡例》称：“志有传，仿史也，”志乃“史家之体”。综观全志，基本体现纂修者的这一思想。李奎宣评曰：“循其起，直面核，质面有文，”不为过誉。

据说，1958年3月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成都借了“一吉普车书”，其中就有这套嘉庆《四川通志》，参阅《毛泽东借阅

的是否是“四川省志”?)《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今存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

### 【民国】《四川通志》

杨森等修，宋育仁等纂。杨森，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民国初期官至四川督办，1977年卒于台湾。宋育仁，字芸子，又字芸岩，号问琴阁主，晚号道复。四川富顺人。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肄业，师从王闿运，与杨锐齐名，并称为“扬雄、宋玉”，光绪五年(1879)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光绪十七年(1891)任广西乡试副考官，光绪二十年(1894)出使英、法、意、比，充驻英二等参赞，甲午战争时，在英国密谋借款购买舰队，偷袭日本，密谋失败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辞差回京，进呈《采风记》，被誉为“四川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回国后，参加“强学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宋育仁奉旨回川办理商务，在重庆创办四川地区第一张报纸《渝报》，被称为“四川报业鼻祖”，光绪二十三年(1897)兼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创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印行《蜀学丛书》，是四川地区维新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后，由京从海道趋赴行在，分发湖北试用道，辛亥革命后，1914年受聘为国史馆纂修，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称帝，主张还政于清，被递解回原籍，编管于成都。1916年以后，任四川国学院(即后来的“四川国学专门学校”)院长，创办《国学月刊》，兼四川通志局总纂，编撰《四川通志》。1931年病逝于成都东山草堂(今成都三圣乡)，享年74岁，私谥“文康”。宋育仁一生著述颇多，计有《孝经正义》、《说文解字部首笺正》、《经术公理学》、《经世财政学》、《时务论》、

《采风记》、《问琴阁丛书》等经史、政论、诗文数十种。事迹具佚名《宋育仁轶事》、宋维彝《宋芸子先生行状》、萧月高《宋芸子先生传》、易公度《宋育仁先生传略》、《补遗》、刘海声《宋育仁先生年谱》等。

自1816年嘉庆《四川通志》纂修后，四川已有百余年未再修通志。1920年5月，四川省长杨庶堪，颁令成立重修四川通志局，负责指导全省地方志纂修工作。是年通志局颁发“县志纲要”11项，交由各地实行。这是民国时期四川省政府颁行的第一个关于修志的条例。但因省长杨庶堪旋即去职，各议俱寢。

1924年，杨森任四川军务督理，宣布设立“重修《四川通志》局，聘请当时蜀中名儒宋育仁为总纂，陈酉生为协理，龚煦春、周翔、张森楷等参与修纂。本届省志编修因川中时局及经费等客观原因，艰难进行，至1931年底宋育仁去世时，只完成《四川通志》初稿。后由通志局协理陈酉生、提调苏兆奎共同负责辑补。陈、苏二人不久也去世，通志局陷入瘫痪状态。1935年刘湘统一四川后，曾函请邵明叔（从恩）、尹仲锡（昌龄）分任正、副总纂。邵、尹二人联名复函辞谢。通志局主持无人，员工相继星散。1936年，编成《四川通志》稿本共300余册，均为毛笔小楷抄正线装。其中内容，多原辑录旧省志中之礼俗、寺观、祠庙、职官、学校、人物等门类的资料，亦有一些新采访得来的史料，但是数量不多。宋育仁去世后，加之川中军阀混战，遂无人再举修志事，并使部分稿子散失，诚为一大憾事。而设局初期编制的《重修四川通志目录》则在宋育仁去世后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成册。宋氏有言称：“今先出全书目录，以证修订之旨要”。总目分八门近二百个类目，较之旧通志，自是有许多改进，门类设置更趋合理，而且拟编纂大量清末民国初的珍贵史料。故此次省志之编修，陈义虽高，然终未毕其功，稿本又散佚近

半，仅仅留下一部分抄录之残稿，今仅存一百二十九册稿本，存者多系采辑、抄录之资料，是志之优劣便不能进一步评说。

今存民国二十年（1931）前的残稿本，为卷五十二之部分。

### 【民国】《重修四川通志例言》(一卷)

民国宋育仁撰，龚维铎辑。宋育仁，见“【民国】四川通志”条。龚维铎，成都人，字葆青。生卒年不详。《益州书画录补遗》称其“长诗古文词；善书法，深得赵孟頫遗意，有名一时。”

《重修四川通志例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志书，它只是宋育仁编纂民国《四川通志》时所拟的一些章程、条例。龚维铎《跋重修四川通志体例》言此例言编辑的原委，曰：“甲子（1924）之秋，公请广安将军（杨森）主持其事，遂礼聘先生（宋育仁）为修志总裁，而分聘全蜀故旧耆贤分任编纂。先是，巴县杨沧白省长在任，立案修志，分县派款，设局筹备。军兴旋罢，至是书局重开。先生手创条例以谕同事诸君，随时印发，积之渐久，或至遗忘。爰哀辑成册，重加校印，分贻乡帮硕彦，及于海内名流，共相商榷。知先生述作斯志之心，亦即为重修蜀志之缘起。”

此《例言》收录了宋育仁为编《四川通志》所拟的20篇文章，分别为：《拟修四川通志例言》、《论史学方志上》、《论史学方志下》、《厘订长编初稿略例》、《修志审定体例得失旨约》、《重修四川通志功课门目》、《重修四川通志功课表》、《分功规约》、《征集处校讎规约》、《开始校补功课例略》、《修志重言》、《校讎程序分门旨约》、《分功程序条限续言》、《第二期开辑长编分功约说》、《长编功课期限列目说明书》、《长编功课说明书续言》、《修志旨要续约》、《拟选四川文征例言》、《分致各道县请采访调查表式》、《重修四川通志成书成绩表》。书后有龚维铎《跋重修四川通志体例》。这些规章是研究

民国《四川通志》编纂过程、编纂方法的重要参考资料。

今存民国十五年（1926）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

### 【民国】《重修四川通志目录》(不分卷)

宋育仁、陈钟信纂修。宋育仁，见“【民国】四川通志”条。陈钟信，字孟孚，富顺县自流井（今自贡市自流井区）人。光绪四年（1878）中秀才，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殿试二甲第十九名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十六年（1890）散馆，光绪十八年（1892）擢文选司掌印郎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鸿胪寺少卿，宣统二年（1910）任顺天府府丞，辛亥革命后返川，寓居成都，研习书法，自成一体。以其声望，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并为民国《富顺县志》的总检校，为民国《富顺县志》的成书做出了贡献。

1921年富顺宋育仁主修《四川通志》，历十年而稿未就，临终托钟信毕其功。接手后，《四川通志》原订九门，已成六门，拟裁并一门，续成二门。至1934年，《四川通志》大体已具，乃编《重修四川通志目录》一书，并为后序。

今存民国25年（1936）铅印本。

### 【民国】《重修四川通志稿后案》

不署撰人。

此《后案》印刷板式、字体与《重修四川通志例言》、《重修四川通志目录》相似，疑为同时、同地所印，或出自陈钟信之手。

民国《四川通志》共分八门四十七目，副录若干篇，总计一百六十七卷。《后案》按编撰顺序，依次介绍各门各目的主要内容。最后强调通志取材的标准，称“必其有系于国政民生者，始列于篇”。

今存民国间铅印本。

### 【民国】《四川郡县志》(十二卷)

龚煦春纂。龚煦春，字熙台，号几山，井研县来凤乡龚家坝人，清光绪时廪生。他博闻强记，精于古文，擅长史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煦春与井研县人吴嘉谟（蜀尤）合力修纂《井研光绪志》，体例完整，记叙翔实，考证有力，文词质朴，是同时期地方志之代表作。民国二十四年（1935），煦春参加《四川通志》重修工作，负责编纂地理门，“甄采舆地专书，广辑职方掌故”，对有关四川政区沿革考订精详，历三年修成《四川郡县志》一书，资料丰富，考订有证，条目清楚，翻检方便，“兴废必详其始终，迁徙必溯其渊源”。煦春早期著作，尚有《洪范旧义》、《陵阳水道考》、《苏文定公年谱》、《国朝四家文选》、《古文辞汇约编》及《几山文集》等。除文史地理外，煦春尚精于金石考古之学，且酷爱收藏古器古钱，凡贵重古器皿之疑难争议，一经煦春辨析，即能真伪立定，平息众论。

民国二十五年（1936），曾参与纂修《四川通志》的龚煦春把自己负责编纂的“地理”部分辑为《四川郡县志》十二卷刊刻印行。这在龚氏自撰的“四川郡县志序”中说得极为明白：“民国重修通志，余承乏纂修，专任地理一门。时阅三年，稿凡四易，共成四川疆域沿革考十一卷，四川疆域革表一卷。同人等以此志精核翔实，为自来官修志书所未有，劝抽梓以广其传。”

《四川郡县志》全书中所收资料丰富，条目清晰，考订有征，对四川及邻省边地由汉代迄清末各府、州、厅、县的建置变迁、历史沿革列之甚详。并附有历代疆域沿革表。但因成书匆匆，又缺乏实地勘察，仅从史籍所载采辑汇编，再加上版刻之错讹，使此书略显粗糙。十年之后，四川永宁李铁夫购得该书版片，重新校印，是为

民国三十五年（1946）重校本。关于《四川郡县志》的编撰过程、价值、不足等，可进一步参阅陈红梅《龚煦春的〈四川郡县志〉》（《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今存民国二十四年（1935）原刻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重校本，又有1983年成都古籍书店铅印校点本。

### 【民国】《四川各府厅州县沿革表》

丁焯超辑。丁焯超，生平不详。

此表成于民国年间，内容转抄自《四川通志》及《四川郡县志》等书中的沿革表。

今存抄本。

### 【民国】《四川省概况》

四川省政府编辑。

书成于民国年间，仅一册，不分卷，而分为五篇，第一篇自然环境，第二篇政治概况，第三篇经济概况，第四篇教育概况，第五篇卫生概况。各篇之下，又分若干章节。

今存民国二十八年（1939）铅印本。

### 【民国】《四川方志简编》

李肇甫、舒君实、陶元甘等编。李肇甫，字伯申，四川省巴县人。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立法院立法委员，司法院大法官。舒君实，生平不详，曾任《华西日报》社长兼总主笔，与李宗吾交往密切。陶元甘，中国古代史和四川地方史专家，1942年担任四川通志馆采访组组长，主持编写了《四川方志简编》。

民国三十一年（1942），由舒君实首倡，合于李肇甫，再告之省政府，经省政府同意后，再次成立“四川通志馆”时，李肇甫任馆长，舒君实任主任秘书，陶元甘为采访组长。筹备新修省志之同时，派员采录各种旧志所载，由李肇甫领衔、陶元甘主持、舒君实润饰，辑为简编九册，纪事至民国初期，此即《四川方志简编》。此书主要是依据未最后纂修成书的民国《四川通志》稿本汇辑而成。书不分卷，而分作“总论”、“分论”两个部分，总论下设十三门，分论下则依地区逐一系列，县各为章，门类设置同于总志，共约40万字。大部分是从各种旧省志转录，如历史沿革、山川古迹、学校书院、祠庙寺观、职官人物等。但也搜集了一些自嘉庆《四川通志》以后失载的史料，特别是清末至民国初期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例如，民国初期兴起并开办的川省航空、邮政、电话、国内外商业贸易事业；教育制度的改革，高等教育、初中等教育的国民教育和实施；新闻出版，民众文化的建设等等。著名人物如骆成骧、刘光第、杨锐、邹容、彭家珍、喻培伦、熊克武、蒲殿俊、刘湘、廖平、宋育仁等，还有在四川之名宦如骆秉章、丁宝楨、蔡锷等。

今存民国三十三年（1944）抄本。

### 【民国】《四川新地志三编》

郑励俭纂。郑励俭，东北大学教授，抗战后入川，驻三台县。

此志分三编十章，章下自分若干节，30余万字。自民国二十八年（1939）着手编纂，四历寒暑方成书印行。主要汇编了四川之地质、气候、山川、物产、交通、人口等资料，而不录政治历史、职官人物之类。第一编自然地理，即记述四川之地域、地质构造、地形、政区、河流、气候等。第二编人文地理，则集中叙述四川之经济、交通和人口，包括农业、工业、制造业、矿业、商业、水陆交



通、人口分布等。第三编区域地理志，以四川地形的不同而逐分论，如盆地分平原区、浅丘区、微摺区、山地区；盆周分北、西、南边缘区；盆地外分东南、西北边区。各地区内又大体分为地形、交通、物产、人口、民族等等。总体而言，这是一部记载四川现代地理、气候、交通、物产、人口的专书，各章节、各类日详略不等，但不失为研究巴蜀人文地理、经济发展的珍贵史料，特别是其中关于交通、物产、人口、民族、工商业、各种加工工艺技饰的资料。

今存民国三十一年（1942）重庆正中书局铅印本。

### 【民国】《川康边政资料辑要二十九种》

边政设计委员会编。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加强对川康边区的统治和开发，在抗战时期，曾由委员长成都行辕组织力量，收集有关文献资料，调查川康边区各方面的情况，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整理编辑成《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在成都印刷，线装成十六大册。此资料包括川康边境地区二十九个县的基本情况，200多万字。主其事者为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湖北蒲圻人，陆军大学毕业），他在序言中说：“蜀中古称天府，幅员之广为各省冠。而西、北、南边区各县邑，尤多边民聚居，习俗锢蔽，知识盲昧，矿产蕴而未辟，土地荒而未治，施政者亦以化外视之，积有年矣。国光任参谋团主任时，即注意川康边事之整理，思有以易其俗，齐其政，壅通浚发，俾侷于中土。第以交通梗阻，情况隔阂，欲明了其实情，非先从调查入手不可。而调查之始，尤必赖有详确之图籍参稽互证，庶免冥行暗索之消。爰烦边政设计委员会就川康两省边邑之志乘图书，公私记载，以及各种刊物，凡有关边事，信而可证者，罔不甄综搜采。都凡二十九县，详其区域，条其风俗，推表山川，胪列士官，宜名之曰某某县资料

辑要，发交各部分研讨。曾一度设调查团赴宁属八邑考察，颇有斩获。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奉命设行辕于成都……值此抗建并进之际，川康既拥有丰厚之资，则及时图维，尤不容有所徘徊矣。故欲言开发，非具备相当人力财力不能进行。而规划初，仍必有资于图籍。前所辑资料一书，虽未足言详瞻，但大体已具梗概，堪供讲求边区政治教育者及各地军政人员之探索寻绎。续往彼方视察者，得是书而览之，亦可获资借鉴。循是以往，由研究而进于实施，经营缔构，协力以赴，使边邑之发展得与内地相互提携，道一风同，民康物阜，完成建设新西南之使命，乘韦嚆矢之功，兹编有焉。因饬详加校勘，正其伪误，补其阙略，复加绘各图，命工排印，刊既成书，此以弁其端。”由此可知，此资料最早策划于贺任参谋团主任时，初稿成于边政设计委员会及其组织的宁属调查团，修订补充、完备刊印于贺任成都行辕主任时。

民国二十六年（1937），宁属（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地资料编就，初名《宁属各县概况资料辑要》，油印若干部。且又分别将所属九县之辑要也油印出来，以资继续补订完善。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贺国光升任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兼省府秘书长，再命边政设计委员会重行整理油印稿，并将今属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所辖各县均编纂成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大功告成，用铅字排版印行。总计二十九县：西昌、冕宁，越嶲、会理、宁南、昭觉、盐边、盐源、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松潘、理番、汶川、茂县、懋功、康定、泸定、九龙、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瞻化、德格、雅江，理化、巴安。除此之外，尚有《义敦概况资料辑要》一种。民国二十八年（1939）12月4日，义敦复县方才正式完成，疑时间仓促，未收入《川康边政资料辑要》。其编纂方式悉依县志体例，收录川康边区各县概况，所列有疆域、沿革、山脉、河流、气候、建

置、建设、种族、户口、官制、交通、民政、司法、行政、财政、教育、警团、储蓄、垦务、产业、物产、礼俗、生活情形、语文、宗教、名胜、古物、古迹、人物、大事记等三十门类。资料多的县按二十多个门类，资料少的县按十余门类归纳叙述之，并各附有三百万至四百万分之一比例不同的地图。因为是搜录多种史籍记载汇编而成，所以书中条目之下多注明出处。其书稿编就之后，又复派员至各地实地勘察、采访，是故其准确性、可靠性更大。又因系川康边地资料，多是彝、藏、羌、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书中所载，便多偏重于种族、垦务、产业、山川、交通等门类。其中清末民国初期的垦务、改土归统、道路修筑、产业和土特产品等资料颇有价值。由于川康地区之史地资料极少，有些县根本就没有编纂过志书，所以这部资料辑要亦显得珍贵了。总体而言，此资料辑要内容充实，多采用民国时期的实地调查材料，且能注明来源出处，条理分明，叙述通畅，比较确切真实，颇有参考价值。

其中，《宁属各县概况资料辑要》为最先编成，也是最完备的一组。“宁属”，即攀西，因清置宁远府而得名。宁远府所辖各县级区域有西昌、冕宁、越嶲、会理、宁南、昭觉、盐边、盐源八县。《宁属各县概况资料辑要》是这八县资料既分别成篇、又汇集在一起的文献。此概况资料除具有前述边政资料的共有特点外，它以夷情、荒地为主，收录的关于种族、垦务、产业、山脉、河流、交通诸门的资料特别详尽。编辑此文献的边政设计委员会在《例言》中云：“奉命从事边政设计，其范围为川、康、甘、青等一带边地，是诸边地情形，既与内地迥殊，亦复彼此互异，国人睽隔，素多懵然。……曾呈准以搜集文献及实际考察为设计前之工作，对于搜集文献一层，经同人短期内旁求之结果……其有关各种官文书，私家著述，及报章杂志等，虽比较为多，但所得亦不过各一二十种而

止……而边籍残缺特甚，亦可从知。”又言：“有事涉两县，难于分别者，如越嵩与冕宁，盐源与盐边，会理与宁南，西昌与昭觉，以夷情一项而论，其支派之分布，巢穴之联贯，多属横跨两县，当时调查人员之记载，即并从两县而笼统举之，今悉以列于一县，而于他一县本门之下，注明详见某县某门字样，以资识别而便检寻。”

《西昌县概况资料辑要》之《种族》，指出历史上在今德昌、普威地方有昌州卢姓长官司管苗民（按：系概指少数民族而非专指苗族）271户，普济州吉姓长官司管苗民536户，威龙州张姓长官司管苗民215户后，接着引调查材料说：“吉伟住普威场，张少勋住威龙州（按：在今米易挂榜），卢少江住德昌。其中，张、卢二土司已无形消灭，吉土司势力有增无己……有枪炮百七八十枝，财产十余万元。”该资料所列普威一带分布的彝族家支情况是：尖山子夷支格衣，汉音姓何。何香廷、何小马头、何甚华、何海廷、何海源、何春廷、何甫三（按：皆奴隶主，下同），共有枪六七十支，财产三万余元，家娃（按：指奴隶）五百余名。坝地山夷支理勒，汉音姓雷。雷万成、雷海山、雷九九，共有枪十余枝，财产千余元，家娃八十余名。小岭岗夷支立婆，汉音姓彭。彭大伯母、彭二伯母、彭三伯母，共有枪七八枝，财产二千余元，家娃五十余名。大木杆夷支勒姑，汉音姓李。李茂田、李阿合，共有枪三十余枝，财产四万余元，家娃三百余名。三家村夷支杂理，汉音姓李。李金山、李金华、李八儿，共有枪三十余枝，财产二万余元，家娃百余名。麻陇夷支日补，汉音姓何。何松茂、何正芳、何金山、何萨牛、何茂之，何茂三，共有枪二百余枝，财产十余万元，家娃千五百名。老鹰岩夷支哦兹，汉音姓禄。禄大马头、禄二马头、禄三马头，共有枪二十余枝，财产八九千元，家娃百余名。马鹿寨夷支立帝，汉音姓傅。傅吉昌、傅和龄、傅当利、傅万山，共有枪百余枝，财产五万余元，

家娃二千余名。黑谷田夷支尸哈，汉音姓田。田子和，有枪十余枝，财产万余元，家娃百余名。该资料说：“属于普格德昌两分县及普威乡者，夷人不设党族，以本支为党，虽系家族亲戚，偶因细故，即成冤家。”“夷汉相处，有如水火。夷不抢汉，汉必欺夷。恶感日深，好感无由。”

《西昌县概况资料辑要》的《垦务》记载了当时普威乡有很多荒地。如麻陇，“现有汉民十余户，系因夷人保护，年与夷人纳租，无区团实力之可言。地权纯为民有，面积水田八百余亩，旱田千余亩，夷人霸去者亦千余亩。”“麻陇附近夷人为何、李二家，共有快枪一百余枝，家娃八百余名，最不安分，西、盐、会三县边民，鲜有不受其害者。”又言“查麻陇位于夷巢中心，最难防御。将来开垦，一面严飭该管土司保护，一面须与附近荒地同时开垦，以便联络，且须于要隘处筑碉，以资防守。”

《盐边县概况资料辑要》记载当时盐边有汉人五千余户，夷人二千余户。《盐源县概况资料辑要》说两盐境内土司所管迁入的彝族家支，米、刘二支属中所，胡、马二支属瓜别，罗、岳二支属右所。又左所、前所、后所境内则米、刘、胡、马支均有。两盐土司素有“五所四司三马头”之称。其中，马喇、萆苴芦二土司领地全在盐边，右所、中所二土司领地部分或大部分在盐边。从前引西昌资料已可看出，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宁属土司分化很大，多数衰败破落，少数集土酋、官僚和小军阀于一身而势力膨胀。盐源资料后附《九所土司最近概况》的内容，更详细记录了这方面的情况。如暴发户“萆苴芦葛土司，昔为左所属官……因其处境气候温暖，谷产丰富，虽曾中落，但现任葛善继，雄猜阴狠，毙前土司葛世藩而代之。购置快枪百余枝，曾任盐边前团务副处长、民团副指挥等职。县政之举措兴革，悉操其手。法团机关，一唯所命。虽为马头，其武力财

力皆驾各土千户而上之也。”而成为破落户的马喇土司，“实各土司之首长也，昔年各所入贡，均须该所钤印署名，以明真伪。其辖地自清末分设盐边县后皆隶盐边。但其先世二百余年来，已将所有土地主权，陆续转让，至清末而告罄。现盐边毗连滇界之偏外华银（荣）庄等地（按：即今华坪部分地方），皆系马喇土司所售出。其后裔琐尾流离，鲜有识其为世守苗裔者。”至于处于两盐东部，所辖“上五地”在盐源，“下五地”在盐边的八姓右所土司，和位于两盐中部的出产更为丰富、交通又居冲要、人气更为旺盛的已姓中所土司，也都是由于“骄奢妄僭，淫佚坐食……偶遇事变，则以顶当土地”等恶习，和欺压汉人，“驯至汉弱夷强，汉贫夷富，浸假而汉人所顶之照业田地，转让于猓掌握……尾大难掉……竟超土司而操纵”等原因，以致衰败下来。

此外，还有论当地交通曰：“该县（盐边）山多渡少，惟铁索桥有数道，如县城外及喇市（今永兴乡）后面，麻柳坪、桑园各处之铁索桥均系官劝民捐而修建。”又如，论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处，曰：“汉人多系贵州、广东及两湖等籍。夷人有白耳子、猓、□□（此处缺二字，应为少数民族名）、摩梭、苗子等族。全县汉占十分之六，猓占十分之三。□□、摩梭、苗子约占十分之一。全县汉人约五千户，夷人约二千户。”（《盐边县知事张尚仁报告》）

关于《川康边政资料辑要二十九种》的介绍，可进一步参阅丁香《可供参阅的川康边政资料——攀枝花乡土文献丛谈十》（《攀枝花日报》2008年8月1日）

今存民国二十九年（1940）铅印本，另有少量民国二十六年（1937）油印单种本子。